



# 佛學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

智八 銘

中國的音韻學起源於何時，無法作確切的認定。但梁武帝時，沈約爲尚書僕射（約當西元五〇三年）。他撰寫了一種「四聲譜」（又名「四聲韻補」），將每一個字，分爲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。他的這一創新，使中國文字的音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他的「四聲譜」，可能是中國音韻學較早的著作。可惜，這部書現在已經失傳了。

在沈約「四聲譜」之後，隋朝時的陸法言與顏之推等討論音韻，就撰寫了「切韻」一書，共五卷，共分二百零六韻，計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。「切韻」也失傳了，但法國人伯希和，在甘肅省的敦煌石室中，發現「切韻」的三種殘本，其相互補足的結果，補成平、上、去三聲，約存全書的四分之三。到了唐朝的天寶年間的時候，「切韻」曾被孫愐重加刊定過，並改名叫「唐韻」。到了宋朝大中祥符年間（約西元一〇〇八—一〇一六），因「舊本偏旁差謬，傳寫漏落」，宋真宗就命陳彭年和邱雍等人重修，並賜名叫「大宋重修廣韻」，字數增加到一萬四千零三十六字，自此以後，音韻學就大大興盛起來。

佛教傳入中國，一般的說法，是後漢明帝永平十年（西元六

七）的時候。到六朝梁武帝的時代，佛教在中國已相當普遍了。佛教經典輸入了不少。而翻譯的風氣也盛行起來。翻譯外來文字，最重要的是音義和音韻必須要正確，故翻譯佛典的大德們，爲求真求實，莫不精心研究，使譯出的佛典不但要合義，而且要合韻。

據沈括（宋嘉祐八年進士）在他所撰的「夢溪筆談」內，曾這麼說：「切韻之學，本出於西域，漢人訓字，止曰：『讀如某字』，未用反切。……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……梵學則喉、牙齒、脣、舌、之外，又有折、攝二聲。折聲自臍輪起，至唇上發。如「特」（浮金反）之類是也。攝聲鼻音，如「歌」字鼻中發之類是也。字母則有四十二，曰：『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縛哆也忍吒（二合）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（前一「拖」輕呼，此一「拖」重呼）奢佉义（二合）娑多（二合）曠曷攞多（二合）娑（上聲）車娑麼（二合）阿婆娑伽（上聲）吒拏娑頗（二合）娑迦（二合）也娑（二合）實左（二合）佗陀。』爲法不同，各有理致，雖先正有不言，然不害有此理。歷世浸久，學者日深，自當造微耳。」（卷十五「藝文二」）由此可見，漢字之「反切」，

是來自梵學。沈約撰「四聲譜」時，是否多少受到了佛學的影響呢？

所謂「反切」，是以兩字的音，切成一個字的音，宋朝的丁度，在他所撰的「禮部韻畧」內說：「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（亦作翻），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。其實一也。」又黃侃在「音畧」內也說：「反切之理，上一字是其聲理，不論其為何韻。下一字是韻律，不論其為何聲。質言之，即上一字只取發聲，去其收韻。下一字只取收韻，去其發聲，故上一字定清濁，下一字定開合。」由上面的兩段記載，可知梵學的所謂「反切」，是以兩個字的聲、韻合併起來，而成爲另一個字的讀音，如「公」字是由「古」（聲理）、「紅」（韻律）結合而成。這種反切的拼音法，後來被普遍使用。

在佛教僧侶中有一位叫「行均」法師的，且曾直接參加了音韻學的發揚。行均是契丹民族所建的「遼國」人。遼國的國土，當時包括遼、吉、黑、熱、察、綏各省及河北、山西兩省的北部地區。遼國後來被金人所滅，他們只有八世九主，共二一〇年（約西元九一六——一二五年）。契丹民族信奉佛教，曾鏤刻了一部大藏經。現在已失傳了，日本學者曾在中國北方原遼國統轄的地區，曾發掘到契丹藏的殘片。是今日世界上僅存的珍品。行均雖是遼國人，可能不是契丹民族，而是幽州（今河北省北部或山西省北部地區）的漢人。他曾撰有「龍龕手鏡」（亦稱「龍龕手鑑」）。他以漢字的偏旁分部，部首的字以四聲爲序，部中的字亦以四聲爲序。每字的下面詳列別體。於「說文」、「玉篇」之外，搜輯很多資料。佛經內面的字，也不予遺漏，網羅很廣。沈括在「夢溪筆談」內，也提到這件事。他說：「幽州僧行均，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，凡十六萬字，分四卷，號『龍龕手鏡』，燕僧智光爲之序。甚有詞辯。契丹重熙二年集（重熙是遼興宗年號，二年即西元一〇三三年。）契丹書禁甚嚴，傳入中國者法皆死。熙寧中（宋神宗年號即西元一〇六八——一〇七八），有人自虜中得之，入傅欽之家。蒲傳正帥浙江，取以鏤刻。其序末舊云

：『重熙二年五月序』蒲公削去之。觀其字音韵次序，皆有理法，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。」（卷十五「藝文二」）由這段記載，可知行均對音韻學有很深的研究，他所搜輯的文字包括佛經文字在內，共達十六萬個，比沈約的「四聲譜」所收的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，和陳彭年所修「廣韻」的一萬四千零三十六字，要多出十幾倍，他的努力，對中國的音韻學貢獻最大。

讀沈括的「夢溪筆談」，才憬悟到契丹藏爲什麼會失傳的道理，契丹藏之所以失傳，實與契丹嚴格的「書禁」有着密切的關係，漢家的學者，都有保存古籍的偏好。如行均的「龍龕手鏡」，當時雖不准流通漢地，但被虜去的漢人得到以後，以生命爲代價，冒險帶回漢地，乃致能流傳後代。若契丹藏當時准予流通漢地，現在或也能保存下來，那末，對世界佛教學者研究佛教北傳流佈的情形，將有莫大的幫助。

在高僧傳中有一段記載說：「天竺方俗，凡是歌詠法言，皆稱爲唄。至於此土詠經，則稱爲轉讀，歌讚則號爲梵唄。」胡適在他的「白話文學史」內，認爲轉讀與梵唄同出一源，他說：「印度的文體，注重音韻，以入弦爲善，初期的和尚都是西域人，故輸入印度人的讀經與念唄之法……大概誦經之法，要念出聲調節奏來。是中國古代所沒有的。這法子自西域傳進來，後來傳遍中國。不但和尚念經有調子，小孩念書，秀才讀八股文章，都哼出調子來。都是印度的影響。四世紀晚年，支曇籥（月支人）以此著名，遂成轉讀的祖師。」胡適的這段話，與沈括所謂的「切韻之學，本出於西域。」的說法，完全相合。雖然胡氏所說的着重於「轉讀」與「梵唄」，但這二者都以「音韻」爲主，講音韻就得注意文字的讀法，無形之中，促使當時的中國學者的注意，而改變中國文字的讀法。故沈約在五世紀所撰的「四聲譜」，已受佛家音韻的影響就有相當的可靠性了。

筆者對音韻學毫無研究，祇是平日讀書的時候，凡涉及音韻的說法和有關人物，方便筆記，現在將它們纂綴成文，以供方家的參考而已。